

# 林耀华先生与新中国的民族研究

胡鸿保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2)

**摘要:** 林耀华是解放前就享有国际声望的中国人类学家, 在新中国的民族研究实践和民族学学科建设活动中, 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共产党员经受了历次运动的考验, 在社会科学研究和应用以及民族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进行学术反思、总结经验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对于新中国人类学学术史的研究依然需要克服一定的困难。

**关键词:** 学术史; 民族研究; 人类学; 林耀华; 新中国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的历史, 浩淼博大, 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 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

——江泽民<sup>[1]</sup>

林耀华先生(1910~2000)是享有国际声望的中国学者, 解放前就已经以《金翼》、《凉山夷家》、《义序宗族的研究》等著作而在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界占有重要的地位<sup>[2]</sup>。英伦学究莫里斯·弗里德曼的弟子们就认为, 林耀华和费孝通、田汝康开启了一条“中国本土社会学中受英式训练的人类学路线”, 它对于“在英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开启了一条中国路线”的弗里德曼有不可低估的影响。<sup>[3]</sup>不过, 本文要集中评论的是林耀华对新中国的民族研究以及人类学等相关领域的学术贡献。

解放初期, 中国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语言的实地调查<sup>[4]</sup>。林耀华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费孝通和林耀华在 1956 年主持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是年 5 月在列宁格勒召开“全苏民族学会议”, 林耀华代表中国民族学工作者出席并在大会上宣读了此文。1957 年 3 月, 民族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名为《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事过不久, 民族学与作为民族学家的费孝通便遭受不测风云, 历史转入沉重的一页。

《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著作<sup>[5]</sup>, 其中的一些见解至今对于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仍然具有启发意义。比如他们认为, 一门学科应该依靠结合实际生活所提出具体的问题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 而不是先从定义入手; 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一切民族在内, 而不是单单关注落后人群或少数民族:

把少数民族和汉族分开来作为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根据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由于民族主义的偏见, 歧视殖民地的各民族, 曾经把所谓‘文明人’的研究划在民族学或‘社会人类学’的范围之外。这是错误的。我们将以苏联民族学为榜样, 批判这种资产阶级错误思想, 而肯定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一切民族在内的, 在中国的范围里, 不但要研究少数

民族，也要研究汉族。

民族学在中国还可以说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因此还有许多人对于这门学科的名称、内容和方法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在这里不想从定义、学科分类上进行讨论。为了避免各种讨论成为学究式的辩论，我们认为最好从这门学科所进行的研究工作的本身来说明它的内容，而且只有在研究工作中，一门学科的性质和范围才能逐步明确起来。一门学科的发展，我们认为，并不依靠开始时把范围划好，界碑树好，而是依靠密切结合实际生活所提出具体的问题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实际生活是丰富的、变化的，一门学科能从这个丰富和变化的泉源出发，它的工作也会是活泼的、常新的。我们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来为中国民族学提出它的任务的（第 33-34 页）。

当前我们不是也在强调“民族学不仅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吗？是否在经历了一番艰难曲折后又重新回到 50 年代的思路上了呢？

林耀华还是所谓“苏联模式”时期中国民族学的一面旗帜，后人描写这段历史时，就以林先生为代表展开评论。如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在他研究中国人类学的专著中就曾提到<sup>[6]</sup>有些人甚至一提到中国的“苏联模式”就气愤不已。例如，林耀华说，中国民族学家从来就没有把苏联的民族学当成榜样，更多地只是拿它们作“参考”。林的反应或许折射出人们事后对某一时期明确存在于中苏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吹毛求疵，这种说法与实情是有些出入的；然而，在此问题上的敏感和自傲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只要提到人类学科学，就离不开苏联对中国的重大而持久的影响（第 168 页）。

当我问林耀华，考虑到中国民族学家先是采用西方模式，然后是苏联模式，90 年代他们会效仿哪种外国模式时，他笑着回答：“我们取这两者最好的部分，然后发展自己的模式。”他接着解释说，中国人再也不会单纯地照搬外国模式了（第 326 页）。

新中国的民族学（或者“民族问题研究”）与政治运动密切相关是不争的事实<sup>[7]</sup>。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几乎都可以作为民族学史小阶段的分期界标，“反右”自然也不例外。敏锐的学科史研究者已然注意到，中国民族学界的老交替竟是由这场政治运动来完成的，尽管这种变化完全不符合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sup>[8]</sup>。于是，不论今天的评论家感情倾向如何，模范党员林耀华在 1957-1966 的十年间被历史地留在了民族研究学科大舞台的中央，较之他那些被剥夺权利、“缺席”“靠边站”的昔日师友，客观上对学科的发展（尽管是曲折的却并非停滞不前）产生了更多的影响<sup>[9]</sup>。而且这种并非“常态”赢得的“先机”一直保持了大约十年之久<sup>[10]</sup>。若从生命史的角度看，“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一批老学者即使“熬过”“文革”，也多半失去了为发展中国民族学做贡献的大好时光，像费孝通那样焕发“第二次学术青春”者实属凤毛麟角。因此，今天我们说林耀华对中国民族学的贡献超过了他的老师吴文藻、“青胜于蓝”，其实并不奇怪，至少他的学术生命比他的老师长。

至于当事人事后如何看待亲身经历的历史，这里恰巧有两个现成的样本供我们讨论。费孝通在分别接受美国人类学家巴博德和顾定国的采访时有如下应答：

巴[巴博德]：但你是功能主义者。你从未讲过奴隶制阶段、封建主义阶段、或摩尔根。

费[费孝通]：对，对了，甚至那时我也未真正全部接受那些。关于那些问题我保持沉默。

巴：但那种理论看来是那时候发表的论少数民族的全部文献的特征。

费：到处都是，除了在我的著作中。……<sup>[11]</sup>

我[即顾定国——引者注]问费孝通，你认为 1957 年和 1958 年对你所作的指控是否有属实的地方，费孝通略一沉吟，说，“1957 年的批判只是反映当时的情况。历史不能被批判。

人们必须找出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sup>[12]</sup>

1957年以后,中国民族学继续前进,在田野工作方面,社会历史调查仍然轰轰烈烈;在理论研究方面,重要的建树则有“经济文化类型”学说和关于“民族”译名和定义的探讨。在政治风暴使得一些杰出的民族学家过早葬送学术生命后,林耀华一度学术地位分外醒目。除实地调查和课题教学外,他发表的论著有《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1961)和《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问题》(1963)<sup>[13]</sup>。

其实,在此有必要指出,考察解放以后民族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应该注意到两种传统的交汇。杨堃就认为民族学有资产阶级民族学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两大分支,而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所谓民族学就是资产阶级的学科<sup>[14]</sup>。这种思想后来在施正一的广义民族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sup>[15]</sup>。郑杭生在他对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中也提出了中国社会学领域的两种传统并做了仔细的分析<sup>[16]</sup>。所以,我们不仅要思考“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术队伍中后来出现的红白分化,更应该考虑到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与“革命干部”和“工农群众”的地位差异。

施正一,1932年出生、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民族学家,是一个勤于思考、紧跟形势的人。50年代他赞成在民族学领域清除资产阶级影响,90年代他牵头组织编写出《广义民族学》。顾定国在写中国人类学史时注意到并引用了施的观点<sup>[17]</sup>。1990年施正一曾经与人谈起:“从1955-1963年的八年中,我写了大约150万字的手稿,而当时公开发表的还不到8万字,只有二十分之一。为了发表一点文章,我不知受了多少气,还挨了好几次批判,甚至还被扣上‘反党’、‘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修正主义’的帽子。”<sup>[18]</sup>

关于“民族”一词的讨论,当时看到的更多的是“苗正身红”的学者发表的文章。比如,牙含章(1916~1989)就是一个典型。牙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题为《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翻译情况》的论文<sup>[19]</sup>,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问题专家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作为共产党员、红色专家的林耀华自然没有能够像“右派分子”那样“清闲”。他经受的是另外一种压力。在为后学留下功力深厚的专题论文的同时<sup>[20]</sup>,林先生也在从事“另类”写作。1958年夏,在“拔白旗、插红旗”的斗争中,“林耀华……作了检查,对自己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资产阶级民族学的路线和方法作了批判”。依他晚年自述,“我那个时候相信路线始终正确,所以尽量从自己身上找错误根源,……在痛苦的思想反省和认真的检查中,我们这些搞民族学的人纷纷表示要‘大破大立’,拔掉资产阶级民族学的‘白旗’,插社会主义的红旗。为了争做红色专家,拟定和提交了个人红专计划。”1960年,在接受上级任务、批判资产阶级民族学时林耀华被指定为小组召集人,还“写了《美国资产阶级民族学心理学派的反动本质》的初稿”。就在当年,林耀华被推选为北京市群英会的个人代表,参加全国教育、文化、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sup>[21]</sup>。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的是一个带着镣铐跳舞的林耀华的图像,然而,他还是在民族学大舞台的中央活动,并没有靠边站。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人类学首先在南方复兴,1981年梁钊韬在中山大学重建了人类学系。先师生前不止一次向我提起在重建过程中得到了林先生的声援(个人交流)<sup>[22]</sup>。此后不久的1983年,林先生也在同事们的协助下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今民族大学)建立了“民族学系”并出任系主任。林先生还培养了包括新中国第一个民族学博士在内的一大批民族学博士和硕士。就此一点而言,时势和命运让他有幸超过了他的师辈吴文藻、潘光旦等人。不过我同时注意到,林先生至少在1980年代早期是执著于民族学、而并不倾向在民族学院建立“人类学系”的,这又与费孝通、梁钊韬、陈国强等的思路略有不同<sup>[23]</sup>。

回头再看关于“民族”概念的结合实践的理论研究,林先生文革之后培养的几位博士和

硕士研究生对此问题有薪火相传性质的深入研究，并且目前都在该领域占据国内领先地位。这些成果包括张海洋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1996）和潘蛟的博士论文《“民族”一词的舶来以及相关的论争》（2000），以及纳日碧力戈的专著《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2000）<sup>[24]</sup>。

除此之外，林先生的晚期研究有较大一部分集中在对新中国民族研究的回顾和前瞻，包括总结经验方面<sup>[25]</sup>。本来在 1956 年的“12 年科学研究规划”中，林先生与费先生等都认为民族研究并不仅仅局限在少数民族研究，只不过事后的局势让他们失去了对汉民族展开人类学参与式研究的机会。80 年代以后尽管林先生未能亲身从事这方面的田野作业，但是他指导自己的学生继承了先前开创的事业<sup>[26]</sup>，而且随着《金翼》等早期著作的翻译或整理出版，从文献的角度实际上为下一代学者指明了一个新方向<sup>[27]</sup>。在关注自己文化、重视历史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材料的结合、运用“小说”表现手法等人类学方法论上，都给年轻人耳目一新的感受<sup>[28]</sup>。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曾言：“‘过去’就是以后不会改变的资料。但是对于过去的认识却在逐渐深化……”他还认为：“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sup>[29]</sup>几年前陆键东为我们奉上了一部有震撼力的传记史学著作——《陈寅恪的最后 20 年》<sup>[30]</sup>。作为一个中山大学校友，我很高兴看到母校历史上的伟人的高尚人格能教育后学、彪炳千秋。同时我也联想到，共产党员是“三个代表”的实践者，知名人类学家里，林惠祥（1901-1958）和林耀华都是解放初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梁钊韬（1916-1987）则是临终前不久才被批准成为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入不入党？要求加入什么党？一个做过入党宣誓的共产党员与非党员的差异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或明或暗地困扰着学术史的实践者的同时也使学术史的编纂者们犯难。而人类学家恰恰又是喜欢研究他者却最不愿意自己被当作研究对象的一类文人。马林诺斯基的中国高足许烺光先生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回顾当年道：“马林诺斯基曾在特洛布里安岛屿住过四年从事田野研究。他把特洛布里安岛的土著人际关系与其他民族间的人际关系作比较，找出相同处和相异之处，但从不把特洛布里安岛人与英国人或其他白人作比较。其他英国人类学家像弗特斯和伊万普里查德等都有这种倾向。他们认为英国及其他白人都是科学家、绝不可能沦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至于其他非白人的文化是可以拿来检视、分析、探讨和归类的。而英人及其他白人是超越被检视研究之上，他们是‘父母’，研究、分析其他‘子女’世界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的。”<sup>[31]</sup>尽管经历了几代学者的艰苦努力和主客互渗之后，以多元文化为客体的真正的“人类学”（而非“另类学”）开始出现在全体地球人面前，可是学术反思或自我批评依然相当困难。今天看来，无论如何，学术应该“与时俱进”；不过，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历史的研究和写作还很艰难。

## 参考文献

[1]引自江泽民致白寿彝的信，见《史学史研究》，1999（3）。

[2]参考林耀华：《林耀华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庄孔韶：《林耀华早期学术作品之思路转换》，载林耀华：《义序宗族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

[3]参见 Hugh D. R. Baker（裴达礼），Stephan Feuchtwang（王斯福）ed., *An Old State in New Setting: Studies in Social Anthropology of China in Memory of Maurice Freedman*, Oxford: JASO, 1991；“序言”；杨春宇、胡鸿保：《弗里德曼及其汉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开放时代》，2001（11）。

[4]详情可参考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5]单行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

[6][美]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中文版，胡鸿保、周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我和王建民等在《中国民族学史》“下卷”的“导论”一章对分期问题有详细的述评。我们把1950年以后的中国民族学史分成三大阶段、五个时期。详见该书，13-14页.

[8]其实这不过是指“西方民族学”系统的“南杨（成志）北吴（文藻）”的退出和林耀华为代表的第2代占据“领导”位置。参考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20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因为在我看来，民族学也与社会学一样，有所谓“马克思主义传统”和“西方民族学传统”两支，而不仅仅是一支。参见胡鸿保：《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透视》，载《云南社会科学》，1992（4）.

[9]《中国思想史》的作者葛兆光对于人文思想脉络的延续有一种借自中国画论的喻说，叫做“无画处尽是画”，形象地阐释了所谓“空白”的意义。见葛兆光：《无画处尽是画》，《读书》2001（2）.

[10]胡鸿保：《试析林耀华的社会人类学思想》，《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0（6）.

[11][美]巴博德：《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客问》，载费孝通：《城乡和边区发展的思考》，225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12]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22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3]这里姑且不论“原始社会史”方面的研究。以上论文均收入林耀华：《民族学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4]杨：《民族学概论》，第4、10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5]施正一：《关于广义民族学若干基本理论问题》，载《理论思维与民族科学》，52~96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16]参考郑杭生：《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载《光明日报》1985-07-29.

[17]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31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8]施正一：《我的学术道路》，载《理论思维与民族科学》，245~246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19]参见牙含章：《民族形成问题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并注意“后记”所做的说明。王建民等：《中国民族学史》，下卷，221-225页，云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20]至少林先生晚年的学生张海洋受这些论文思想影响颇深。见张海洋：《浅论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族群认同与跨文化传通——学习林耀华教授〈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问题〉的体会》，载马启成、白振声主编：《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研究——庆祝林耀华教授从教62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1]参阅王建民等：《中国民族学史》，下卷，190、219-220页。林耀华：《林耀华学述》，200~205页、217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22]顾定国写道：“梁还设法利用外界的支持意见来影响中大的领导小组成员；著名民族学家、共产党员林耀华在直接提交给中大党委的一封信里所作的陈述就起了关键的作用。”见《中国人类学逸史》，13-1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还可以参阅黄淑婷：《耀华师为建立和发展中国民族学作出重大贡献》，载马启成、白振声主编：《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研究——庆祝林耀华教授从教62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3]顾定国指出，文革以后，费孝通一度反对重建人类学。见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8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4]张海洋和潘蛟的博士论文皆为林耀华指导；纳日则是林耀华指导的硕士，后由林先生推荐在本校随马学良教授攻读博士。

[25]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章均收入林耀华：《民族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6]庄孔韶：《银翅》，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6。

[27]林耀华：《金翼》，北京，三联书店，1989，2000；林耀华：《义序宗族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28]对于“凉山夷家”的追踪调查和对外宣传是林先生 1980 年代重要成就之一（见林耀华：《凉山彝家的巨变》，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展开讨论。

[29]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46、105 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0]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 20 年》，北京，三联书店，1995。我想提一个细节供有心人思考：顾定国笔下的中国人类学史是以梁钊韬的个人史为线索展开的。在这两部分别以中山大学两位名教授为主角的著作中，居然两人、甚或他们之间可能的交往，都不见诸于对方的史传，而他们确实曾经是二十年的历史系同事，在一个单位共同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这二十年的历次政治运动。史家对于史料的强烈的“选择性”由此可见一斑。

[31]国立编译馆主译：《边缘人：许光回忆录》，54 页，台北，南天书局，1997。

## Professor Lin Yao-hua and the Ethnic Studies in New China

HU Hong-bao

(Research Center for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Lin Yao-hua was a famous Chinese anthropologist with high fame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 before Liberation.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new peoples' republic, as a communist from the old intellectuals, he suffered a lot in those political movements on by one. Meanwhile, he did great contributions in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as well as in the enterprise of the education of minorities. Now it is necessary to do reflection and make a summary to thes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However, as to the research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of New China, there are still some obstacles wants to be overcome.

**Key words:** academic history; ethnic study; anthropology; Lin Yao-hua; New China.

收稿日期：2004-03-21；

作者简介：胡鸿保（1948-），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